

https://farid.ps/articles/israel_attempted_assassination_of_konrad_adenauer/zh.html

对康拉德·阿登纳的未遂暗杀：旨在破坏赔偿的阴谋

在战后西德的早期岁月，康拉德·阿登纳作为该国首位联邦总理，成为重建一个被摧毁的国家并恢复其全球地位的关键人物。作为坚定的反纳粹者和虔诚的天主教徒，阿登纳从1949年至1963年领导西德，将其引导向民主、经济复苏以及与昔日敌人的和解。然而，他为大屠杀暴行与以色列谈判赔偿的努力使他成为极端主义反对的目标。1952年3月27日，一枚寄给阿登纳的包裹炸弹在慕尼黑警察总部爆炸，炸死一名警察，并揭露了一个与以色列激进分子梅纳赫姆·贝京有关的惊人暗杀阴谋。本文探讨了这一大胆企图刺杀总理的背景、执行和后果，揭示了冷战历史上一个鲜为人知的篇章。

康拉德·阿登纳与赔偿协议

康拉德·阿登纳于1876年生于科隆，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具有反纳粹的历史。作为魏玛共和国时期科隆市长，他抵抗希特勒政权，忍受监禁并在战争期间隐居。1945年后，他共同创立了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并于1949年成为西德首位联邦总理，任务是重建一个废墟中的国家。他的外交政策优先考虑与西方的整合以及与包括法国和美国在内的昔日对手的和解。他的道德和外交议程的基石是应对德国对大屠杀的责任。

1951年，阿登纳启动与以色列的赔偿协议谈判，旨在向大屠杀幸存者和新生的犹太国家提供经济补偿。这些谈判于1952年9月在卢森堡协议中正式化，引发了深刻争议。在德国，一些人视赔偿为经济负担或集体罪责的承认，而在以色列，许多人反对接受德国的钱，将其视为对负责六百万犹太人灭绝的国家的合法化。激进团体，特别是与犹太复国主义准军事组织伊尔贡有关的团体，谴责该协议是对大屠杀受害者的背叛，认为幸存者应直接获得付款，而不是资金通过以色列政府用于国家建设项目。

梅纳赫姆·贝京与伊尔贡的联系

暗杀阴谋的核心是梅纳赫姆·贝京，以色列历史上的巨人，后来从1977年至1983年担任总理，并于1978年因戴维营协议分享诺贝尔和平奖。1952年，贝京是赫鲁特党的领袖，该党根植于修正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并是伊尔贡的前指挥官，该组织是负责在巴勒斯坦对英国军队袭击的前国民兵。贝京的家人在大屠杀中丧生，他激烈反对赔偿协议，将其视为允许德国“购买”赦免的道德妥协。

贝京的反对不仅仅是修辞。根据后来的揭露，他积极支持刺杀阿登纳以破坏赔偿谈判的阴谋。该计划由一小群前伊尔贡成员策划，其中包括埃利泽·苏迪特，他在几十年后出版的回忆录《Be' shlihot Ha' matzpun》（《良心使命》）中详细描述了自己的参与。苏迪特的叙述得到德国记者亨宁·西茨2003年书籍《对阿登纳的暗杀：一个政治攻击的秘密历史》的证实，揭示了贝京在批准、资助和规划行动中的核心作用。

阴谋展开

暗杀企图既大胆又业余。1952年3月27日，一件寄给联邦总理阿登纳的包裹抵达慕尼黑警察总部，由于其幼稚的笔迹和错误地址而引起怀疑。该包裹内藏在百科全书中的炸弹，由阴谋者雇佣的两名青少年寄出。男孩们察觉不对劲，转而报警而不是寄出。当警员试图检查包裹时，它爆炸了，炸死巴伐利亚警察卡尔·赖歇特并伤及两人。

同时，两枚额外信件炸弹被寄往以色列和德国代表团谈判赔偿的地点，由一个自称犹太游击队组织的团体声称负责。这些炸弹未达到目标，但慕尼黑爆炸引发了国际调查。法国和德国当局将阴谋追踪至巴黎的五名以色列嫌疑人，全都与伊尔贡有关。其中包括埃利泽·苏迪特，他承认准备了爆炸装置。嫌疑人被捕，但后来被允许返回以色列，证据被封存以避免在德国激起反犹情绪。

苏迪特于1990年代出版的回忆录提供了关于阴谋动机和执行的关键洞见。他声称意图不是杀死阿登纳，而是制造国际媒体关注并扰乱赔偿谈判。“我们所有人都清楚，包裹不可能到达阿登纳手中，”苏迪特写道，暗示阴谋被设计为象征性行动。然而，这一说法备受争议，因为贝京的参与和致命结果——一名警察的死亡——表明意图更严重。苏迪特描述了贝京的个人承诺，包括在资金耗尽时出售金表资助行动的提议，以及与议会成员约哈南·巴德和海姆·兰道以及前伊尔贡情报主管阿巴·舍尔泽的会议，以协调阴谋。

后果与掩盖

阿登纳领导下的西德政府和以色列总理大卫·本-古里安都试图淡化事件以维护脆弱的双边关系。阿登纳知晓阴谋起源，选择不积极追究，担心这可能在德国引发反犹反弹或破坏赔偿。本-古里安支持赔偿协议，赞赏阿登纳的克制，因为公开贝京的参与可能紧张新兴的德以关系。细节在很大程度上被压制直到2006年，《法兰克福汇报》发表苏迪特回忆录摘录，引发新一轮兴趣和辩论。

在以色列，贝京的角色几十年来仍不明朗。他的私人秘书耶希尔·卡迪沙伊和梅纳赫姆·贝京遗产中心主任赫茨尔·马科夫在2006年受访时声称不知情。然而，苏迪特的叙述得到西茨研究的支撑，几乎没有留下贝京参与的疑问。这一揭露震惊了分析家，鉴于贝京后来的和平缔造者地位，并引发了大屠杀后时代政治暴力的伦理问题。

暗杀企图未能破坏赔偿协议，该协议于1952年9月签署。西德最初向以色列支付约30亿德国马克，并向索赔会议支付4.5亿，支付随着新索赔的出现而继续。该协议加强了以色列经济，并在德国的道德清算中标志着重要一步，尽管仍具分裂性。阿登纳的幸存和决心加强了他的国内和国际地位，促进了1953年的连任。

遗产与历史意义

对康拉德·阿登纳的未遂暗杀突显了大屠杀后时代的原始情感和复杂政治。对于贝京及其盟友，赔偿协议象征着对犹太苦难的背叛，但他们的暴力回应风险削弱以色列的道德权威和外交目标。阿登纳压制事件的决定反映了他对和解的务实承诺，即使以透明为代价。该事件还突显了在种族灭绝阴影下导航正义、记忆和国家利益的挑战。

如今，该阴谋是阿登纳和贝京遗产中的脚注，被他们后来的成就所遮蔽。阿登纳被誉为现代德国和欧洲一体化的奠基人，而贝京因确保与埃及的和平而被铭记。然而，1952年的企图提醒了早期冷战年的波动性，当时意识形态分歧和历史创伤滋生极端措施。它还邀请对政治暴力的伦理以及外交在处理过去暴行时的微妙平衡进行反思。

正如历史学家摩西·齐默尔曼所指出的，该阴谋的保密源于保护德以和解的共同愿望。通过苏迪特回忆录和后续报道的延迟揭露，它邀请我们面对一个时代道德模糊性，在那个时代，幸存者、政治家和激进分子以深刻不同的方式与大屠杀遗产搏斗。